

近代文学批评史

中文修订版·第五卷

〔美〕雷纳·韦勒克 著 杨自伍 译



René Wellek

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近代文学批评史

1750 — 1950

第五卷

英国批评：1900 — 1950

〔美〕雷纳·韦勒克 著 杨自伍 译

René Wellek

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近代文学批评史(中文修订版)第五卷 / (美) 韦勒克(Wellek, R.) 著;

杨自伍译. —修订本. 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09. 9

书名原文: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

ISBN 978-7-5327-4810-5

I. 近... II. ①韦...②杨... III. 文学批评史—世界—近代 IV. I1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42502 号

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

René Wellek

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1750—1950

VOLUME 5: ENGLISH CRITICISM, 1900—1950

本书根据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年版译出

Copyright © 1986 by Yale University

中文本版权由 Yale University Press 提供

图字: 09—1996—131 号(5)

近代文学批评史 第五卷 [美] 雷纳·韦勒克/著 杨自伍/译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200001 易文网: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18.5 插页 2 字数 396,000

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3,200 册

ISBN 978-7-5327-4810-5/I · 2686

定价: 45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严重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 T: 0571—85155604

五、六卷前言

这两部书花了较长时间才得以完稿。其中论述个别批评家的文章是历年来发表的，散见于多种期刊，前言之后的《援用已刊文稿一览》，已有交代。撰文之际，我有通盘的考虑，而且有意把这些文章最终纳入这部批评史的项目。

计划著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批评史时，我不久便意识到，不能照搬前四卷的行文组织，即按照国别顺利地展开：第一卷中，从法国写到英国，然后转入意大利和德国；第二卷中，从德国回到法国、意大利和英国，然后再回到德国。在三、四两卷中，论述不同国别的章节，则以法国批评各章的顺序为框架，即从最初比较文学的史家，写到象征主义者。

然而，逐渐明朗的态势是，二十世纪初期，英国和美国的学术界，已经摆脱了与欧洲大陆——实际上是与法国——的早期纽带，而且彼此交流甚少。当然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、俄国和西班牙的批评界，也几乎全然忽视了英美批评家。而在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彼岸，局面则并非如此一片黯淡。欧洲大陆的作家，哲学家，美学家，而非批评家，开始对英国和美国的批评界发生了影响。马克思赫然隐现于大量社会说批评的背后，尽管鲜见具体的文本。在美国，可以说三十年代大萧条期间，产生了一场完整的马克思主义运动，在英国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，也出现过一股短暂的马克思主义批评风潮。克

里斯托夫·考德威尔和拉尔夫·福克斯^①，这两位英国批评家，都在西班牙内战中，为了捍卫共和政府而阵亡。弗洛伊德，还有接踵而起但别树一帜的卡尔·古斯塔夫·荣格，也开始触动了文学批评。不仅那些声称恪守精神分析方法的作家们，而且还有其他一些人物，他们拾人唾余，无非关于性欲、无意识、梦的作用等非常笼统的思想，以及俄狄浦斯情结，压抑，集体无意识和原型之类的概念，先后在批评舞台纷纷登场。柏格森在英国一度成为一个重要的影响；尼采，主要作为道德主义者或者说反道德主义者，也赫然隐现于幕后。但是当时出自欧洲大陆的文学批评家，客观上始终不为人知。

彼埃尔·拉塞尔^②，还有大异其趣的于连·邦达^③，这类法国反浪漫主义的论战者，则可以另作别论，托·恩·休姆，托·斯·艾略特，赫伯特·里德等人人都知道他们，美国的欧文·白璧德，也读过他们的论著。不过他们其实是空想理论家和宣传者，而非文学批评家。只有托·斯·艾略特和埃兹拉·庞德，接触过真正的法国批评家，如雷米·德·古尔蒙和拉蒙·费尔南德斯^④。最为重要的是贝内迪托·克罗齐的影响，他早期的《美学》^⑤于一九〇七年译成英文，虽说

① 福克斯(Ralph Fox, 1900—1937)，英国批评家。著作有《列宁传》、《马克思与现代思想》、《小说与人民》等。

② 拉塞尔(Pierre Lasserre, 1867—1930)，法国文人。著有《法国浪漫主义》，攻击浪漫主义，矛头指向卢梭。

③ 邦达(Julien Benda, 1867—1956)，法国小说家、批评家。提倡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，抨击当时以柏格森为代表的浪漫派哲学。在《知识分子的背叛》中，他指责当代思想家放弃真理，屈服于政治激情。

④ 费尔南德斯(Ramon Fernandez, 1894—1944)，法国批评家。与托·斯·艾略特的批评思想有相通之处，主张客观性和无个性。主张批评探究艺术作品的哲学基质。著有文集《启示篇》及《论巴尔扎克》、《论普鲁斯特》等。

⑤ 中译本标题为《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》。

在细节问题上,往往难以推本溯源。看来这是他唯一在当时产生过一些影响的一部著作。在美国,克罗齐在乔尔·伊·斯宾加恩的著述中,发现了其忠实的阐说者;英国哲学家罗宾·科林伍德的美学论著《艺术原理》(1934),还有他史学理论的著述,也表明了克罗齐的影响。五十年代以前,当代的俄国和德国批评家,在英语国家中,完全不为人知。因此论述欧洲大陆时,暂不考虑英美批评,看来有此必要,也有充分的道理。

由于研究的课题超过了适当的一卷的篇幅,遂决定将这部著作分为两卷:第五卷论述英国批评,第六卷论述美国批评。应该承认,可以提出有力的论据来表明,本世纪英美批评传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,以下事实就十分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:埃兹拉·庞德和托·斯·艾略特,这两位美国批评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一刻来到英国,他们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后来英美两国的批评,而且成为本世纪趣味转向和理论变化的核心人物。一位在本国和美国都给批评留下深刻烙印的英国人,则为艾·阿·理查兹,他身为教授,在哈佛大学度过了整整二十个春秋(1943—1963),乔·威尔逊·奈特,也是在多伦多大学当了九年(1931—1940)英语教授之后,才回到本土英国。其他英国批评家赴美,至少是在暑期班任临时讲师和导师(如威廉·燕卜苏,赫伯特·里德),或者像弗·雷·利维斯那样,参加有组织的巡回讲学。像戴·赫·劳伦斯这样一位非学者型的人物,也在美国西南部长居,不过他在踏上这片国土之前,已撰述过美国文学的论著。

交流也另有途径:除了那些决定滞留欧洲的人物之外,如艾略特,庞德,桑塔亚那,我们不可忘记,多年游学英国,势必对美国的罗

兹奖学金获得者产生了作用,如约·克·兰塞姆,弗·奥·马西森^①,克林斯·布鲁克斯,罗·佩·沃伦。其他诸位晚年作为客座教授,也在英国度过了较长时间,如爱伦·泰特,理·帕·布莱克默,莱昂内尔·特里林,当然,美国的学人和教授,也热切地访问英国,经常出入和利用图书馆。二十世纪的流动性——生活富裕和出行便捷——使得这些来往较之以前的世纪,更为频繁得多,不过即使没有个人联络,两国的图书交流也很快捷,而且往往在确立和保持名望时,起着决定作用。英国图书,通常时隔一年,便出现了美国版;而美国图书交付给英国出版商的情况较少。研究一下这类相互交流,或许会显示诸多脱节和偏重的现象,但是也会显示,国际图书贸易成为传播批评思想的一个主要媒介的过程。

虽然上述种种均为真实情况,但另一方面来看,无可否认的是,本世纪上半叶期间,英美批评的演变互不相通。举例而言,一九一〇年两国的局面完全不同。在英国,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开始称雄文坛,学术地位把持在风雅的鉴赏家手中。在美国,报章批评把持在披露丑闻者和属于美国商业文明的批评家的手中,他们称道自然主义小说,因为作品抨击了作家迫不得已的生活环境。一种煞费周章而偏重事实的学风,在高等学府一统天下,尽管每每遇到新人文主义者的挑战,他们则从阿诺德的学说中汲取灵感,以求维护古典文学遗产。这两种传统大相径庭,至少在新批评学说出现之前是如此,甚至在此之后,二者的区别也一直十分显豁。利维斯夫妇在英

① 马西森(Francis Otto Matthiessen, 1902—1950),美国批评家。著有《托·斯·艾略特的成就:论诗歌的本质》、《亨利·詹姆斯:主流的一面》等。详见《批评史》,卷6第4章相关论述。

国的影响,在美国得到了微弱的附和,而像伊弗尔·温特斯或肯尼思·伯克^①一类人物,他们的影响也始终限于美国本土。美国批评家中,只有爱德蒙·威尔逊,在英国堪称成功,不无矛盾的是,在许多要点上,不妨说他抱有强烈的仇英情绪。在撰写一部英美两国的批评史时,分别按照顺序来阐述,这是不可避免的,即使两种传统交流密切。

这部批评史的前四卷正文后,附有充分的资料,其必要性在于我决定,将所有援用的节译文献原文,一并付印在注释中,文献译自法文、德文、意大利文、俄文及丹麦文。由于五、六两卷的全部引文均为英语,故而没有必要附加如此之多的资料。我仍然坚持为每条引文提供充分的参见出处,因为这部批评史的要求之一便是,本书基于对援引的每一部书,进行可以考证的查核,不过现在我采用的方式,是尽可能在正文中简写出处,不用以前指明汇集于正文后注释的上角标码。在引文出处过长而且可能妨碍行文流畅的情况下,引证文献仍在大大减缩的注释中有所交代。

参考书目罗列了我所运用的图书,并附简称,还有少量有关本书论述的作者或论题的精选评论。现今拥有如此之多的文献信息来源,比如《现代语言协会文献》年刊,所以似乎不必逐一列举。选择范围集中于关于所论作者文学批评的评论。在参考书目和一般论述有助于研究批评的学者的情况下,有时也收录在内。

① 伯克(Kenneth Duva Burke, 1897—1995),美国批评家。著有两卷本《对待历史的态度》、文集《语言是象征行动:论人生、文学、方法》等。对当代美国批评家颇有影响。详见《批评史》,卷6第14章。

历年来,友人纷纷提出了建议和批评。有的读过部分文稿,或对已经发表的文章有所评论。我尤其感激老友和合作者奥斯丁·沃伦的帮助,还要鸣谢小洛里·纳尔逊,芭芭拉·罗森克兰斯,以及阅读过本书论托·斯·艾略特一章的某位隐去姓名的读者。

历年来,承蒙多种机构资助我的著述项目。谨向第三次授予我一九六六—一九六七年度研究基金的古根海姆基金会表示谢忱。一九六九年春,我作为富布赖特讲师,前往德国讲授美国批评。一九七二年我从耶鲁大学退休后,又成为一九七二—一九七三年度美国人文科学基金会的高级会员。一九六六、一九六九、一九七七我三度应洛克菲勒基金会之邀请,在贝拉吉奥的论坛研究中心作为期一月的讲学。一九七七年我曾任康奈尔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。

我还要向曾经利用过的各地图书馆表示感谢。倘若没有耶鲁大学图书馆慷慨提供的便利,本书便无法写成。我也偶尔咨询加利福尼亚大学在各地的图书馆,如圣地亚哥、里弗赛德、圣巴巴拉各分校,还有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、衣阿华大学、布卢明顿的印第安纳大学、普林斯顿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图书馆;伦敦的不列颠图书馆,牛津大学图书馆,美因兹大学图书馆,亚历山德里亚图书馆,罗马大学图书馆。

耶鲁大学出版社的本书编辑爱伦·格雷厄姆和杰伊·威廉斯工作细心,理应特别鸣谢,还有克里斯托弗·勒米林,两卷的人名索引均由他编制。

雷·韦
纽黑文,康涅狄格
一九八五年四月

说 明

我援用了本人的下列文章,有时加以扩充,删削,更改。

导论:《关于本人〈近代文学批评史〉的反思》,见《描写诗学和文学理论学报》第3期(1977):第417—427页。转载于《抨击文学及其他文集》(1982),第134—145页。另见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八届年会会刊,1976》,布达佩斯,学院出版社(1981),第439—447页。

《安·塞·布雷德利、莎士比亚与上帝》,见《从乔叟到吉本:纪念科特·阿·齐曼斯基文集》(1975),第85—103页。另见《语文学季刊》第54期(1975):第85—103页。

《批评家弗吉尼亚·伍尔夫》,见《南方评论》第13期(1977):第419—437页。

《戴·赫·劳伦斯的文学批评》,见《斯瓦尼评论》第16期(1983):第598—613页。

《埃兹拉·庞德的文学批评》,见《丹佛季刊》第3期(1976):第1—20页。

《托·斯·艾略特的批评》，见《斯瓦尼评论》第 64 期(1956)：第 398—443 页。

《重读艾·阿·理查兹》，见《南方评论》第 3 期(1967)：第 533—554 页。

《弗兰克·雷蒙德·利维斯的文学批评》，见《文学见解：批评与历史文集》，卡罗尔·坎登编(1964)，第 175—199 页。另有《晚年的利维斯》，见《南方评论》第 17 期(1981)：第 490—500 页。

《弗·威·贝特森的文学理论》，《批评文集》，第 29 卷(1979)：第 112—123 页。

五、六卷导论 方法与范围

我读过史学方面大量的新文献,从中可以推知,至少在英美学术界,分析哲学的方法一统天下,但是我却怅然而弃,因为客观而论,这些著作和论文,分析的问题与批评史撰述关系不大,或者毫不相干。多半这些论述关涉的是道德责任或罪咎问题,正常或反常的人类行为,暴卒和行刺之类的意外事故。如此一来,我们便不免要思考这样一类问题:“布鲁图为何刺杀恺撒?”或“为何路易十四驾崩时,已不得民心?”甚至没有人在任何地方提出过,一部批评史所要探讨的是截然不同的问题。我们必须从其他领域,另找同类问题,以及可能存在的范式。

显而易见,批评的历史,在一个突出的方面,与政治、社会或经济的历史相去甚远;批评的历史所依据的文本唾手可得,大家可以研读,发表意见,加以解释,进行论辩,作出批评,逐一完成,仿佛文本昨日才完稿,尽管它们或许成书于大约二千三百年之前(诸如亚里士多德的《诗学》)。因此批评史并非我们编写战役史这层意义上的史乘。倘若重构滑铁卢战役,就得以史载中目击者的记述为依据,成文的军令或兵力部署,或者可能的话,根据一些残存的实物,而荷马史诗或柏拉图对话录一类的文本则依然存在,正如帕台农神庙,或阿雷那小教堂^①内,乔托的壁画依然存在一样。尽管如此,批评的历史与艺术、音乐或诗歌的历史的不同之处在于,它没有面临两种媒体相互移

译的任务(或者用目前流行的说法,从一种语言或者代码移译成另一种)。撰写批评史的过程中,我们使用而且不得不使用相同的语言(即使我们是从古希腊文翻译),即概念的语言。简而言之,批评史表述的是和一切的思想史相同的问题:举凡哲学史,美学史,政治、宗教、经济的思想史,语言学以及诸多其他学科的历史。

我们因此有所借助,也有一些范例。遗憾的是,另外几部批评史鲜见可资借鉴之处。在本书前四卷问世之前,仅有的一部批评通史,即乔治·圣茨伯里于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四年间出版的那部三卷本史著,是一部有意反理论的,以印象为主的文学趣味史。圣茨伯里埋怨“茫然探究诗歌本质及合理性问题之类捡羊毛般的失误”^[1],而几乎从不反思自己的著述方法,他提供给我们的只是一幅总图和概貌。罗·萨·克莱恩^②关于约·威·赫·爱特津斯^③《英国文学批评:十七和十八世纪》一书的评论,则颇有可取之处。克莱恩驳斥爱特津斯那种概括理论学说的方法,主张按年代先后,分析具体文本,希望有一部“在何谓批评或批评理应如何的问题上不抱先入定见的历史”,一部“不带论旨”的历史,这个目标我以为无法企及,而且并不可取。^[2]

① 建于1305年,位于意大利东北部帕多瓦城,亦称阿雷那小教堂壁画,包括乔托作品,属于意大利中古晚期绘画的成就。

② 克莱恩(Ronald Salmon Cranc, 1886—1967),美国文学批评家,芝加哥学派主要人物,代表作《批评语言与诗歌结构》(1953)形成了这个新亚里士多德派的理论基础。主编《批评家与批评:古代与现代》(1952)。

③ 爱特津斯(John William Hey Atkins, 1874—1951),英国批评家。著作有《古代文学批评》、《英国文学批评:中古时期》、《英国文学批评:文艺复兴时期》、《英国文学批评:十七和十八世纪》。另有《猫头鹰与夜莺笺注》。

关于哲学史的撰著,已有较多的议论。上迄公元三世纪的第欧根尼·拉尔修,下逮十八世纪的雅各布·布鲁克^①的概要(五卷本,1742—1767年出版)和威廉·戈特利布·坦尼曼^②的十二卷本(出版于1798—1817年),直至黑格尔的《哲学史讲演录》(出版于1833—1836年,不过根据手稿和学生的抄本,有时可以上推至1815—1816年),我们能够从中追溯哲学史编纂的沿革。黑格尔以前的全部哲学史,不妨称之为希腊先哲学说汇编学,即哲学家学说的总结与阐说,编排上或据学派(如柏拉图派、怀疑论派、伊壁鸠鲁派、斯多葛派等),或按年代,以尽量中允客观的笔法为宗旨,虽然不难窥见,布鲁克带有莱布尼茨哲学倾向,或坦尼曼带有康德哲学倾向。随着黑格尔的出现,哲学史整个概念为之一变。黑格尔在绪论中坚定地表明,“一门学科的历史,密切地依傍人们对这一学科所抱的观念。”他承认,哲学“较之其他科学而言的不利条件在于,关于哲学应该而且能够完成的任务,存在着看法上的极大分歧”。(而这种情况更其符合批评学科。)但是有些人埋怨,哲学表现形式的多样性,黑格尔则难得地流露出枯燥的风趣口吻谈到,他们就像医生,建议他吃水果,而他然后又不肯吃樱桃、李子、葡萄的人一样。^③“因此多样性之于哲学的存在,并非是一种损害,而是一种绝对的必要。所以哲学史的研究

① 布鲁克(Johann Jakob Brucker, 1696—1770),德国哲学家。欧洲哲学史编修的创始者。维柯在《新科学》中已提到她的《理念的原则的哲学史》(347),见朱光潜译本144页。著有《批判哲学史》,为第一部德国的哲学史。初版于1744年出齐,新版分为6卷(1766—1767)。

② 坦尼曼(Wilhelm Gottlieb Tennemann, 1761—1819),德国哲学家。主要作品为《哲学史》(11卷,1789—1819)。

③ 马克思在《批判的批判》中借用过这个著名的比喻。

究,乃是哲学本身的研究。”他所设想的哲学上的差异,并不是一个漫无目的的序次,而是“一个有机地发展的整体,一个合理的延续”。哲学具有的历史,乃是“一个必然的、连贯的进程”。各种哲学都是必然的。没有一种哲学全然衰亡。最新的哲学,他指的是他本人的哲学,乃是“集先前所有哲学之大成”。黑格尔阐述了这样一个悖论:“在哲学史上,尽管它是历史,我们却不必处理任何成为过去的问题。”他说,“真理没有历史,不会成为过去。”^[3]黑格尔的言外之意是,史家有权利和义务去判断和确定,哪些思想才属于演变中的环链。黑格尔《哲学史讲演录》中,导论性质的反思,时至今日仍觉切中要害,对于一位批评史家来说,也是中肯的意见。

他们提出了我必须正视的问题。能够与人类的其他活动脱离开来的“批评”之类的学科是否存在?批评是否显示出某种统一性、焦点、延续性?我已经对这两个问题作出了“肯定”回答,尽管贝内迪托·克罗齐,在早期册子《文学批评》(1894)中,埃里希·奥尔巴赫,在关于本人《近代文学批评史》第一二卷的评论中,都否认批评是一门自成一体的学科,因为存在着“繁多可能出现的问题,还有种种问题的交错现象,假设、目的和重点方面极端的多样性”。^[4]我愿意作出的答复是,任何探讨文学的话语都是批评。如同许多其他门类的科学一样,批评因此已为它的论题明确界定了范围,而且问题与途径之繁多,恰恰是本书的主题所系。本书的一项任务,便是理顺各种界说和看待这门学科的不同方式。一部探讨批评、文学、诗歌的观念的历史,乃是本书的根本核心之所在。

克罗齐和奥尔巴赫,看到的只是樱桃,李子,葡萄,似乎便否定水

果的存在,而其他的史家则力求摒弃水果与整个植物界的区别,或者撇开这个比喻,这里是指文学批评与其他批评的区别,比如艺术批评和音乐批评,他们甚至否认能够探讨批评,除非是作为通史的一个分科。现实形成了一张无缝网罗,人的任何活动无不涉及他的所有其他活动,这种观点含有一个无可否认的真理。文学批评关涉文学史和其他艺术门类,关涉学术史,不论政治或社会方面的通史,甚至经济状况,也在批评的历史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作用。人们一再尝试简单地批评当作一面反映具体时代与形势的镜子。因此伯纳德·史密斯^①,在《美国批评的各种力量:美国文学思想史研究》(1930)中,强调地说明,“在我看来,文学批评与诗歌和小说相比,更加明显地涉及社会史。”^[5]批评显现为“意识形态”——不是指世界观的通常意义——而是作为一种看待现实的虚妄意识,作为特定的文学或社会趋向的单纯喉舌。批评逐步融入了文化史,变成了文化变迁本身的表现。我们所面临的是决定论的整个问题,是这样一个观点:“凡事必须不仅和其他所有事物联系起来对待,而且要把它视为某种其他事物的征象。”^[6]我已经多次在其他著述中^[7]论述过这一问题,在此只能重申我的论断。起因说——就莫里斯·拉·科恩^②所界定的意义而言——作为“凡是先例发生,后果必然随之而来时的某个理由或缘由”^[8]——并不适用于文学史或批评史。一部作品可能是另一

① 史密斯(Bernard Smith, 1909—),美国批评家。主要著作还有《现代主义历史:二十世纪艺术与思想研究》(1998)。另有《批评家是提倡者:1941—1988 年文集》。

② 科恩(Morris Raphael Cohen, 1880—1947),美国哲学家。出生于俄国,著有《理性与自然》和《法律与社会秩序》等,被视为威廉·詹姆斯之后,最重要的美国哲学家之一。

部的必要条件,可是不能说,前者导致了后者。应该许可有几分人的自由,有几分个人的决定权。不过我们不必在此顺着这个抽象的层次展开讨论。

作为批评史家,我必须进行一番尝试,描述批评与人类所有其他活动的关系,同时并不放弃以核心课题为焦点。批评与写作实践的关系,应该始终铭记在心。有些时候,也存在诗人与批评家兼于一身的情况:这在英国文学史上最为显著,德莱顿,华兹华斯,柯尔律治,马修·阿诺德,托·斯·艾略特,这些诗人同时也是批评史上的里程碑。许多批评的著述,是为某个文学趋向或流派而作的辩护书。我只要提一下施莱格尔兄弟是浪漫主义的先声,俄国形式主义者是未来主义的辩护者。批评与美学密切相关;正如克罗齐主张的观点,批评或许仅为美学的一个分科,我确实论述了康德、席勒、谢林、罗斯金和克罗齐这一类作家,虽然我力求避开关于美和审美反应的抽象思辨。批评深受哲学的影响:十八世纪英国批评家的经验主义,与浪漫主义时期德国批评家的唯心主义的,而且有时是神秘主义的臆说,形成了对比,正如他们也不同于十九世纪后期法国的实证主义者。我在斯塔尔夫人竟遭拿破仑的驱逐,或自由思想的宣传者格奥尔格·布兰代斯,再如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激进派批评家们反沙皇的炽热情绪,我在论述以上问题时,就不能无视政治史对批评的冲击。我偶尔也的确考虑到批评的经济基础,批评家各自不同的阶级根源和效忠立场。十九世纪初的德国教授(包括黑格尔在内),在生活方式上,显然不同于波德莱尔那样的巴黎波西米亚式文人,或俄国文坛以笔耕为生的报人,如别林斯基,杜勃罗留波夫,皮萨列夫。